

彻底批判湘剧《园丁之歌》



7.36

97
彻底批判湘剧《园丁之歌》

本社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1974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册

统一书号：10162·990 定价：0.10元



毛主席语录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目 录

为哪条教育路线唱赞歌?

——评湘剧《园丁之歌》 初 澜 (1)

评湘剧《园丁之歌》 湘 晖 (8)

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招魂曲

——评湘剧《园丁之歌》 洪闻学 (17)

按照什么路线培养青少年?

——评湘剧《园丁之歌》 蓝樵育 (27)

《园丁之歌》是孔孟反动教育思想的还魂曲

..... 岳阳地区师范学校理论组 (37)

一出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坏戏

..... 中共长沙市委写作小组 向群学 (46)

鼓吹“智育第一”是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招魂

——评湘剧《园丁之歌》 长鲍文 (54)

教育领域的路线斗争不容抹杀

..... 上钢五厂工人影评小组 曹德超 (62)

党是引路人 驻省空军某部 刘平章 (66)

工人阶级一定要占领教育阵地

..... 天津拖拉机厂工人评论组 (70)

坚持开门办学 反对倒退

..... 临湘县桃林中学大批判组 (73)

《园丁之歌》把青少年引向何方?彭 河 (78)

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公开挑战

——斥“没文化怎能把革命重担来承当”老红军 张文秀 (82)

决不是没文化不能干革命

而是学了文化更好地干革命

.....安乡县安福公社松湖大队党支部书记唐纯银 (85)

贾政和宝钗教育手段的重现

——评方党和俞英的“逼”和“诱”李迪光 (89)

究竟是谁“离了轨”?

.....株洲县白关公社白关大队知识青年理论学习组 (94)

我们要当小闯将..... 红小兵 万学梅
红卫兵 刘亦工 (96)
红卫兵 谭映天

为哪条教育路线唱赞歌？

——评湘剧《园丁之歌》

初 澜

湘剧《园丁之歌》，是一出名为反映“教育革命”，实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招魂的坏戏。它所歌颂的路线和人物都是错误的，其要害就是否定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

在批林批孔运动深入、普及、持久地开展的大好形势下，联系教育战线和文艺战线的斗争实际，把这个坏戏作为反面教材，提供广大工农兵、革命师生和革命文艺工作者分析批判，这对于进一步提高我们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划清两条教育路线、两条文艺路线的界限，巩固并发展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和文艺革命的胜利成果，是很有必要、很有现实意义的。

《园丁之歌》的剧情，说的是一个工人的孩子陶利，本来很有生气，因为想当火车司机，爱玩小火车，就被教师方觉斥为“不守纪律、不爱学习、不讲礼貌”，甚至是不能成“材”的“锈铁”；但在另一教师俞英的“循循善诱”之下，终于“悔悟”过来，“进步了”。这出戏通过它的剧名和全部情节，特别是对俞英这一主要人物的塑造，向观众宣扬了如下的观点：一、培养我们青少年的“园丁”是教师；二、没有文化就不能承当革命的

重担；三、学生如不循规蹈矩地死啃书本，就是“糊不上壁”的“稀泥”。十分明显，这些观点都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旧调重弹，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战线上一系列革命变革的反攻倒算。对此，必须坚决批判。

“花红要靠育花人”，“培育还靠好园丁”，这是贯穿《园丁之歌》全剧的主调。这个主调，把俞英、方觉这样的教师奉为培育青少年一代的“园丁”。俞英、方觉是什么样的人物呢？他们都是坚持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而，这不只是一个剧名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教育事业的领导权究竟应该掌握在谁手里的大是大非问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由于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专了我们的政，我们的学校，竟然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文化大革命的急风骤雨有力地冲击了资产阶级的这块“世袭领地”。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下，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开进了学校，登上上层建筑斗、批、改的政治舞台，与广大革命师生一起团结战斗，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回了教育事业的领导权，改变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胜利。毛主席指出：“**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来，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工人阶级的领导是通过自己的先锋队——共产党来实现的。因此，如果把我们的青少年比作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幼苗”，那么，培育革命幼苗的“园丁”，就是我们伟大的党！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雨露滋润着革命幼苗茁壮成长，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着青少年一代前进的方向！

两个阶级争夺教育阵地的斗争，必然要在领导权问题上进行长期的、激烈的反复较量。我们的教育事业，是党和人民的事业。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加强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推动教育革命深入发展，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项重要措施。但是，资产阶级对于失去这块“世袭领地”，是怎么也不会甘心的，他们总是要用孔孟之道的“师道尊严”和资产阶级的“教师治校”等谬论，来排斥和对抗工人阶级的领导。《园丁之歌》把俞英、方觉这样的教师奉为“树人”的“园丁”，甚至称之为什么“引路人”，大加美化和颂扬，其实质就是否定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而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重新统治我们的学校！

革命的教师，是在党的领导下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的。我国有一支很大的教师队伍。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是好的，是要革命的，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和锻炼，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涌现出许多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同时，由于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这就必须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认真改造世界观，才能不断增强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教育路线的自觉性。在党的教育事业中，一个革命教师的职责是光荣而又重大的。教师在组织、进行教学活动的整个过程中，应当发扬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和积极主动的工作精神。但是，作为教育者，又“有一个先受教育任务”，“要向学生学习，向自己教育的对象学习”。在我们社会主义的学校里，革命的教师和革命的学生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同一条战线上的战友和同志，应当互教互学、共同前进。《园丁之歌》否定这种

新型的师生关系，要恢复几千年来剥削阶级所鼓吹的“园丁”和“桃李”的关系，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无产阶级教育制度，否定了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

《园丁之歌》在俞英的最后一个唱段中，唱出了“没文化怎能把革命重担来承当”的谬论，否定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只强调文化的重要。这是在文艺舞台上露骨地宣扬地主资产阶级的“文化至上”论，贩卖“智育第一”这一修正主义的教育方针。在这出戏出笼的一九七二年前后，教育战线上的资产阶级复辟势力鼓噪一时，胡说什么“教育质量下降”，要走“关门教学”的老路，妄图迫使学生“两耳不闻窗外事”，死啃书本知识，其目的就是为了扼杀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这个新生事物。联系这一现实的阶级斗争背景来看，《园丁之歌》宣扬这样的谬论，也就不足为怪了。

这出戏的全部剧情，集中到一点，就是围绕着解决所谓“学生不好学”的问题，渲染俞英同方觉的“矛盾”。其实，俞英同方觉在维护和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这个问题上，并没有什么区别。他们鼓吹“文化至上”，贩卖“智育第一”的黑货，配合默契，殊途同归。他们的争吵，不过是“方法”之争。《园丁之歌》就是以这种“方法”之争，掩盖了宣扬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实质。方觉用“停课”、“没收”等“管、卡、压”的“行政手段”来推销“智育第一”，俞英却认为这是出于对学生的“关心”、“爱护”和“严格要求”，只是不如她那样“夫子善诱”，“水往根上浇”罢了！她可以同陶利一起玩小火车，然后搞了个“突然袭击”，用一道难题把这个“不好学”的学生憋得“脸上发烧汗直淋”。

她还善于进行这样的“忆苦”教育：以陶利的祖父在旧社会因“望儿成长”，宁可乞求地主的阎王债，也要送儿子去进学堂的家史，来诱使这个爱玩小火车的孩子——“淘气”，“晓得没文化开车也开不上”，服服帖帖地当“智育第一”方针的俘虏！同志们想一想，象陶利的祖父那种行径，不也颇有点武训那种“穷人若是能识字，就不会受人欺负”的味道吗？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伟大时代，不去触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一根毫毛，反而做着“望儿成长”实即“望子成龙”的迷梦，请问，这是哪个阶级的“家史”教育？剥去这个戏所谓“教改新篇”的包装，原来还是武训那个“念书好！念书好！”的腐烂货色，是宣扬“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反动的孔孟之道。

“没文化怎能将革命重担来承当”，这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反动观点，它完全经不起革命实践的检验。几千年来的人类历史，承当革命重担、推动历史前进的，难道不是创造文化却不能占有文化的奴隶、农民和工人，反而是那些奴隶主、地主阶级的“圣贤”和资产阶级的“精神贵族”吗？在我国人民半个世纪以来的革命斗争史上，不是也有成千上万从来进过校门的工农，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勇挑革命重担，为党和人民做出了贡献吗？历史事实雄辩地说明：虽然一切剥削阶级都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剥夺广大劳动人民学习文化的权利，但是为推翻那些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而承当革命重担的，恰恰就是被剥夺了文化权利的广大劳动人民。今天，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为劳动人民

掌握文化创造了条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判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为普及教育和工农兵上大学开辟了广阔的途径。文化，只有掌握在革命人民的手中，才成为革命的有力武器。所以，决不是没有文化就不能干革命，而是掌握了文化更好地干革命。《园丁之歌》鼓吹这种“没文化怎能把革命重担来承当”的谬论，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公然挑战，是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污蔑中伤，也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攻倒算！

教育战线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是为哪个阶级服务，培养哪个阶级的接班人的问题。对《园丁之歌》中陶利这样的学生持什么态度，反映着究竟按照哪个阶级的面貌来教育青少年一代的斗争。陶利本来不错，朝气蓬勃，热爱劳动，立志要当工人。他的行为本身，实际上就是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一种抵制和反抗。但剧本却硬说他“错”。他究竟“错”在哪里呢？无非是触犯了“师道尊严”之“礼”，越出了“智育第一”的轨道。把陶利这样的学生视为“糊不上壁”的“稀泥”、“不成材”的“锈铁”，却把小玲那样“五分加绵羊”的学生，树为“桃李”的标本，这就清楚地表明《园丁之歌》所鼓吹的培养目标究竟是什么了。

毛主席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时而贩卖“读书做官”论，时而又散布“读书无用”论，就是为了破坏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教育方针。问题从来就不在于读书是否有用，而在于为什么人，为哪个阶级所用。马克思主义者历来重视学习和掌握文化知识的必要性，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我们应当了解，废除以前死

读书、实行强迫纪律、死记硬背的方式时，必须善于吸取人类的全部知识”。为着把我们的青少年一代培养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在校学生必须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必须上好社会主义文化课，并使这种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书本知识，同阶级斗争的实际，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如果依着《园丁之歌》宣扬的那一套修正主义教育方针，只讲脱离实际的文化知识，否定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否定又红又专，那就是依了地主资产阶级，即使培育出有“高度的文化知识”的“桃李”，也不可能承当无产阶级的革命重担，而只能成为修正主义的“社会栋梁”和“精神贵族”，成为资产阶级的接班人。由他们去驾驶“时代的列车”，就会象苏修出现的那种情景，大开历史倒车，复辟资本主义！

《园丁之歌》所唱的，就是这种“克己复礼”的调子。它要复“师道尊严”、“智育第一”之“礼”，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之“礼”，复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之“礼”。教育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是长期的，象这样的调子，现在有人在唱，今后也还会有人要唱的。但是，教育革命的小闯将黄帅说得好：“在革命滚滚向前的洪流中，资产阶级老爷们发出悲哀的嚎叫，挽救不了自己灭亡的命运”。坚持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并肃清其影响，这是教育战线极其重要的战斗任务。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师生，必将在这场反复辟、反倒退的斗争中，夺得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更大胜利！

（原载一九七四年八月四日《人民日报》）

评湘剧《园丁之歌》

湘 晖

在批林批孔运动深入、普及和持久的发展中，我国文艺革命的形势一派大好。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和演出活动蓬勃发展；广大工农兵和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对林彪、孔老二的反动文艺观和一些坏作品展开了深刻有力的批判。名为歌颂教育革命的“教改新篇”，实为吹捧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湘剧《园丁之歌》，就是正在受到批判的一出坏戏。

《园丁之歌》是在我们湖南一九七二年的专业文艺调演中出笼的。当时，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整风运动，粉碎了以刘少奇、林彪为头子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仍然十分激烈。一小撮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竭力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搞糟了”，污蔑教育质量“今不如昔”。在文艺领域里，他们反对学习、移植和普及革命样板戏，散布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园丁之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是教育战线、文艺战线上修正主义思潮的反映。

《园丁之歌》写的是两个教师对一个所谓顽皮学生进行教育的故事。它否定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宣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统治学校；它歪曲党的教育方针，兜售“智育第一”和“文化至上”的黑货；它反对“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鼓吹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它的要害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对此，我们必须予以彻底批判。

教育革命中两条路线斗争的根本问题，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问题。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加强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打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而《园丁之歌》却鼓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继续统治学校，取消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

《园丁之歌》的主题歌——“百花园中花似锦，花红要靠育花人，滴滴汗水花上浇，喜看来日满园春”，在序曲、尾声和剧中，以幕后合唱的形式出现了三次。它所反复强调的一点，就是“园丁”主宰学校的一切。“园丁”是谁？俞英对方觉唱道：“好花要靠园丁育，你我共同努力把水浇。”显然，这个“园丁”指的就是俞英和方觉这样的教师，他们都是坚持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世界观并未得到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园丁之歌》把这样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作“园丁”来歌颂，其目的就是要否定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维护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复辟资产阶级教育制度。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是党的阳光雨露，哺育青少年一代茁壮成长，是党的辛

勤耕耘，培育革命新苗欣欣向荣。同时，也是在党的领导下，才团结、改造、教育和培养了教师队伍。我们的教师大多数是好的，坏人是极少数。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广大教师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是愿意在党的领导下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教育战线上一切革命成就，都是实现党的领导的结果。因此，要完成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这个伟大的历史使命，必须要由党来领导，必须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园丁之歌》根本不去表现党的领导，却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吹捧为“园丁”，这难道不是为了否定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吗！

把教师比作“园丁”，把学生比作“桃李”，这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而是儒家的道统，是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剥削阶级从私有观念出发，总是把知识当成个人的私有财产，把学生视作教师私相传授的“门人”、“弟子”。因而，他们要鼓吹和树立“师”的权威。从孔老二的“师道尊严”到修正主义者的“教师中心论”，都是这样的货色。例如，汉初韩婴的《韩诗外传》上说：“夫春树桃李者，夏得阴其下，秋得其实。”历来的儒家，就是把教师比作“园丁”，把学生比作“桃李”的。《园丁之歌》里的俞英不是也说，“看明朝桃红李熟一派丰收景”，大做“桃李满天下”的剥削阶级“园丁”之梦吗？修正主义的反动教育权威凯洛夫，胡说什么教师是学校里的“园丁”和“中心人物”，教师的“每一句话和每一项指示”，对学生都“具有法律性质”，鼓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刘少奇一伙拣起这些封、资、修的破烂，推行一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园丁之歌》就是宣扬这一条路线

的。与此相反，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路线，学校和教师必须置于党的领导之下。教师是党派到教育战线为无产阶级教育青少年的革命战士，他们必须“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向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传授社会主义文化知识。但是，教师为了改造世界观和更好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还必须向自己的教育对象学习。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是在党的领导下同一个战壕的战友和同志的关系。《园丁之歌》把这种新型的师生关系比作“园丁”与“桃李”的关系，这是对社会主义学校师生关系的严重歪曲。

当这种关于“园丁”的论调受到批判以后，有人竟然还辩解说：“《园丁之歌》里的俞英是共产党员，怎么不能体现党的领导？”不对！党的领导，最根本的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看问题不能只看现象，不看实质。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揭露那些标榜自己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马赫主义者时尖锐指出：“判断一个人，不是根据他自己的表白或对自己的看法，而是根据他的行动。”在《园丁之歌》里，俞英虽然挂的是“共产党员”的招牌，但她推行的却是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另外，在剧中既看不到党组织的存在，又看不到俞英和党组织之间有什么关系。把这样的一个人说成是党的领导的体现者，显然是一种不分路线是非，混淆个人与党组织区别的糊涂观念。

二

主张“德、智、体”全面发展，还是鼓吹“智育第一”？这是教育革命中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毛主席教导说：“我

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在社会主义学校里，必须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把转变学生的思想放在首要地位。而刘少奇、林彪却鼓吹“智育第一”和“文化至上”的资产阶级教育方针。《园丁之歌》就是为这一教育方针吹喇叭的。

在《园丁之歌》里，方觉成天忙于抓“作业”、抓“考试”、抓“分数”，完全是一个“智育第一”的推行者。一开场，我们就看见方觉在眉飞色舞地批阅一份百分卷：“好啦！（打钩）好啦！（打钩）全好啦！”“是棵好苗子”。另一方面，他把蔑视“智育第一”的学生陶利攻击为糊不上壁的“稀泥”，不能成材的“锈铁”，抓不住的“野牛”。他恶狠狠地把陶利的小火车摔在一边，破口大骂陶利“不务正业”，“好逸恶劳”。这一鲜明的对比，说明了方觉是以智育作为选择“苗子”的唯一标准的。作为正面人物形象来歌颂的俞英态度怎样呢？她不但没有对方觉的错误进行批判和斗争，而且跟着方觉一道骂陶利为“锈铁”和“野牛”，为方觉的错误百般辩护，把方觉对陶利的“管、卡、压”，美化为对陶利的“严格要求”、“关心”和“爱护”。她根本否定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而只强调文化知识，高唱“没文化怎能把革命重担来承当”。这实质上就是赤裸裸地在宣扬资产阶级的“智育第一”和“文化至上”。

马克思主义认为：路线的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能不能承担革命的重担，首要的是看执行什么路线，而不是文化的高低。如果路线不对，文化再高，也只能为错误路线服务。《园丁之歌》不但把文化当做挑革命重担的唯一条件，而且它鼓吹的所